



杜奉賢 著

中國歷史發展理論

比較馬克思與韋伯的中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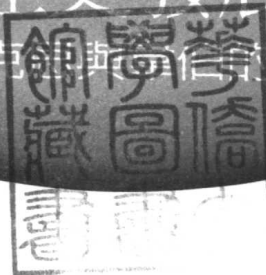


K207
D645

杜奉賢 著

中國歷史發展理論

比較馬克思與毛澤東的中國論



A0905360

正 中 書 局

內容簡介：

中外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關懷和好奇，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問題巨大，到目前為止，還難以找到大家公認的答案。不管是歐洲的東方論或者是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停滯的研究，其中的主要理論，並且也是對立性最強的觀點，分別是來自於馬克思與韋伯的學說。因此本書就從這兩位的學說切入，以對立性的透視而作一雙軌的比較討論。這是一種科際整合的研究，它結合了政治學、社會學與歷史學上理論與證據之間的多重建構。

(本著作榮獲八十五年度國科會甲種獎勵)

作者簡介：

杜奉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社會教育中
心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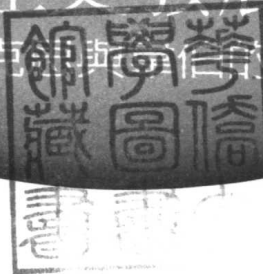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謝韻梅

k207
D645

杜奉賢 著

中國歷史發展理論

比較馬克思與李鴻章的中國論



A0905360

正 中 書 局



自序

筆者在大學任教的課目是中國通史，最早在上這門課的時候，總是在人物、事件、制度之間打轉，但是這些零碎的枝節片斷，除了不同朝代的場景轉換之外，實在想不出這些在西安、北京的故事和修課的同學們有多大的關聯。後來嘗試用社會科學的發展理論來分析歷史，把整個歷史當成一個分析單元來處理。果然這樣的「大歷史觀」可以將許多當今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上的問題，從歷史上明瞭其間的因果關係；如此一來就使得學習歷史不止是聽聽故事，更是在學習瞭解自己和國家社會間的整體。

在學生時代讀書的時候，最佩服的是錢穆大師那種學貫中西，縱論古今的淵博，後來讀到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更爲他那種宏觀的問題卻有精準的分析所折服，及至讀到韋伯的「發展史學」，才警覺那就是我所要的，那才是「通史」。要達到通的地步，就要將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走向發展史學或理論史學，而不止是考據史學；唯有將考據史學與理論史學結合起來，才能使歷史學兼具理論知識與經驗證據，而這本書就是這樣的嘗試。

本書原是筆者的博士論文，在姜新立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另外還經過金觀濤、王仲孚、高宣揚、張維安、顧忠華等教授非常細心的評審，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鼓勵，謹此致謝。

杜奉賢 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國歷史發展理論

——比較馬克思與韋伯的中國論

目次

	自序／3
	導論／7
	第一節 研究背景／8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14
第一篇	理論模式：
	馬克思與韋伯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解釋／21
第一章	馬克思論中國歷史的發展／22
	第一節 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的發展／23
	第二節 天朝時期的發展／31
	第三節 西方衝擊下的發展／39
第二章	韋伯論中國歷史的發展／47
	第一節 大一統之前的發展／48
	第二節 大一統之後的發展／58
第二篇	理論後設：
	對馬克思與韋伯之中國論的後設分析／77
第一章	對馬克思與韋伯之中國論的動機分析／78
	第一節 研究動機／79
	第二節 理論動機／81

第二章	對馬克思與韋伯之中國論的方法論分析／87
	第一節 分析途徑／87
	第二節 分析方法／94
第三篇	理論驗證：
	從中國歷史論馬克思與韋伯的中國論／101
第一章	古代中國和馬克思與韋伯的中國論／102
	第一節 國家的形成／103
	第二節 經濟與生產關係／109
	第三節 政治社會網絡／116
第二章	帝制中國和馬克思與韋伯的中國論／128
	第一節 韋伯中國論的檢討／129
	第二節 馬克思中國論的檢討／136
	第三節 馬克思—韋伯理論的重構／144
	結 論／159
	參考資料／165

圖表目錄

- 圖 1.1 研究架構與章節分配示意圖／15
- 表 2.1 英國輸入中國鴉片數量／40
- 圖 2.1 馬克思論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圖／44
- 圖 3.1 韋伯論中國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網絡圖／74
- 表 6.1 歷代人口與耕地比率／137
- 圖 7.1 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因果網絡圖／163

導論

「爲甚麼現代科學只能在歐洲發展，而無法在中國文明中成長？」

——李約瑟(J. Needham, 1969 : 187)

以上類似李約瑟的想法與努力，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關懷與好奇，在學術界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問題的巨大，到目前爲止，也還難以找到大家公認的答案。本篇論文的方向就是在繼續先進們的努力，不過在研究取向上有所不同；以下即就整個問題的研究背景與筆者個人的研究方法作一說明。

在問題的提出上，本研究無可避免的是以馬克思的問題和韋伯的問題爲導向。譬如「中國爲何發展停滯？」、「中國爲何沒有現代科學？」、「中國爲何沒有現代資本主義？」、「中國爲何沒有產生民主政治？」等等，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容易引起所謂「負面問題」的爭議(韓格理, 1990:229)。不過，我們在此處並不是「從一個有關歐洲的理論中去瞭解中國何以成爲中國」(韓格理, 1990:229)，也不是「傾向於找尋那些不利於發展的因素來回答這問題，……而只單單從『負面問題』的角度來考察，勢必有以偏概全的弊病」(高承恕,

1988：213-4)。此處的考慮純粹只是把此問題的提出，當做一種研究策略，一種啓發性的設計。因爲在自己習以爲常的環境中，無法看出自己爲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原因，而常常會有一種功能性的解釋，那就是以果來推論因，而變成一種爲現狀的辯護，將存在合理化的保守形意識形態。因而此處的研究設計，是經由比較的途徑，去思索其間差異的理由，或許經由此途徑，更能爲當事人開啓一扇新的視窗，避免陷入劃地自限的框架而不自知。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好奇與研究，筆者可以分別從中西兩個不同的學術社群以及目前的研究狀況來作引介：

一、所謂東方論(Orientalism)

早在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B.C.384-B.C. 322)就指出在那些野蠻人或亞細亞地區所建立的政治組織型態，就是由於那些人民沒有權利和主權的觀念，而可稱之爲一種「奴隸社群」(Community of slaves)①。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在十三世紀時被重新引入歐洲政治思想中，而且一直到十七世紀爲止，他的觀念始終是做爲政府組織與型式研究上的焦點。到了十四世紀，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已經在歐洲政治學的爭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時，亞細亞專制的概念已經和缺乏私人財產與權利的概念連結在一起了；這乃是因爲古典希臘時期的主張，他們認爲波斯(Persia)大君對土地和水資源擁有絕對的支配權(Sawer, 1977：5-6)。

在十六世紀初期，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6)繼續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的討論，但他討論的野蠻人和對歐洲產生威脅的異教徒，主要指的是土耳其(Turk)。但是到了十六世紀的另外一位學者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在這方面的討論上，就已經不止是土耳其帝國了，還包括俄國(Muscovy)、韃靼(Tartary)和衣索匹亞(Ethiopia)(Sawer, 1977:8)。

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相信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政府比較近似於他理想中的政府型式。伏爾泰(Voltaire)則認為中國是哲學家帝王的土地，那是一種啓蒙專制(Enlightened Despotism)。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其《國富論》中就發現中國與印度的經濟處於前商品時期的理由是因為在亞洲地區，農業會比製造業獲得更多的尊敬與報酬(Bailey & Llobera, 1981:18-20)。

十九世紀的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把東方與西方、中國與印度作了比較。他認為歐洲有一種內在展現追求進步的自我意識，而相對的中國、波斯、土耳其則發展一種觀念上的、外在的道德意識。中國是一種父長式的帝國，在其中，自我的意識受到極大的限制；中國有文字歷史，有年鑑記錄，但就是沒有哲學史。而印度則是由極端狹隘的種姓階級(Caste)與村社組織所統治，且完全沒有歷史。當中國與印度持續了數千年的停滯(Stationary)時期，中國發展出一種神權式的父長制國家，而使得道德與權利無法區隔^②。至於印度的村社系統則由於在經濟上可以自我滿足，而成為國家停滯的根源(Bailey & Llobera, 1981:21)。

十九世紀的英國學者瓊斯(Richard Jones)就根據十六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紀大發現」中，歐洲人發現了遠東以後的許多旅行者

的見聞報告指出：在東方完全缺乏由中產階級市場所提供的安全保證(Sawer, 1977:11)

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社會的概念主要是來自於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如亞當史密斯注意到中國和其他數個亞洲國家的水利事業，他也特別批評中國、古埃及、印度這些國家統治者因此而獲得的權力。另外像密爾(James Mill)提出亞細亞政府模式，瓊斯在 1831 年總結提出的「亞細亞社會」等。馬克斯在倫敦接觸古典經濟學就繼承這些概念而提出他自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Wittfogel, 1957:372-3)

馬克思死後，蘇俄共黨對亞細亞問題非常的重視，因為這關係到他們革命路線的問題，例如列寧(Lenin)與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對此問題都有相當多的討論。其後，蘇聯的史學界如當時莫斯科馬恩學院領導人李雅札諾夫(Ryazanov)、經濟學家瓦爾加(Varga)、東方史學家馬札爾(Madjar)等，均相繼將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點拿出來討論^③。歐洲方面除了蘇俄之外，像曾與列寧辯論過「亞細亞」的盧森堡(R. Luxemburg)，到後來的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有把「亞細亞社會」的概念提出來討論，這其中又以威特浮格(Wittfogel)和梅洛蒂(U. Melotti)為最著名。

從以上簡要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趨勢：早期馬基維利、布丹、孟德斯鳩所論述的對象是接近歐洲並且為敵的鄂圖曼(Ottoman)帝國，十八世紀以後，「東方」這一概念才慢慢的由土耳其擴張到波斯、印度和最東的中國(Anderson, 1974:462)。在歐洲人的眼中，談到東方就意謂著明顯的把世界區分為西方與東方，後者基本上意謂著一種奇特、異國風情與神秘，而且也帶有一種非理性與潛在的危險(Turner, 1994:44)。整體來說，東方論的出現意味

著西方社會不僅是在地理上認知東方，而且在美學、社會、歷史、語言等各方面都與西方作一區辨和研究(Said, 1979:12)。東方論已經不止是政治學上的討論，舉凡社會、經濟、藝術、文學等各方面都有對東方的探討。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旅行見聞和翻譯書籍的傳播，學者開始注意到東方世界中的不同，像黑格爾雖然還是使用「東方」這一名詞，但是他已經區辨中國與印度的差異。不過，從馬克思到維特浮格，「東方論」這一名詞在地理上一直未作嚴格區分。一般來說是，不同國家或不同興趣的研究者會各自把馬克思亞細亞社會的理論運用在各自研究上，譬如說研究中國的學者就把亞細亞方式運用在中國，如維特浮格、馬札爾等；而研究蘇俄或印度的學者也同樣把亞細亞方式運用在蘇俄或印度等。另外也有學者乾脆就把「東方論」的研究對象限定在中東地區「伊斯蘭文明」(Islamic civilisation)的範圍(Turner, 1978:6)④。

東方論中還有重要的一支是來自於德國方面的學術傳統。早期以萊布尼茲(G.W. Von Leibniz, 1646-1716)為最著名，他是創立柏林科學院的首任院長，其對中國的理解是來自於直接和來華傳教士的接觸。其後又有黑格爾對中國的論述，接著是馬克思(Karl H. Marx, 1818-1883)，再來就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其後還有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榮格(C. G. Jung, 1875-1961)等⑤。

二、對中國發展停滯的研究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的人，是十八世紀英國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他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

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引自白鋼，1984:1-2)。十九世紀的黑格爾也說：「中國很早已進展到它今日的情狀……但它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中國與印度可說猶在世界歷史的局外。」(黑格爾，1830:191)馬克思則在《資本論》中指出：「亞洲國家經常被破壞又經常重建，迅速的改朝換代，而與此相反，亞洲社會卻沒有變化。」(Marx, 1867:358)他所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在企圖說明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思想在五四運動時期經由陳獨秀、李大釗引進中國；五四以後，1921年發生「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接著1928年開始「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這場大論戰反映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內部權力和革命路線的激烈鬥爭^⑥。而不管論戰者的結論：中國社會是半封建的、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在論戰的過程中，必然由敘述各社會的由來，而涉及一個大問題，那就是：自秦王朝至鴉片戰爭，中國歷史如與西歐歷史對比，是長期停滯(鄭學稼，1978:21)。對這問題的討論如果從亞當史密斯提出問題算起，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而如果從社會史論戰起算，也有半個多世紀了(白鋼，1984:1)。

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大多傾向於從經濟、政治、文化和地理各個方面來尋找原因；特別側重於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研究。或者是分析中國封建剝削關係的殘酷性，指出這種剝削制度怎樣一次又一次的把農民推向死亡線，怎樣使生產發展和積累發生中斷，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

還有一種觀點是認為，中國是以強大的中央集權克服分散性，這種巨大的官僚系統，依靠政權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閉關自守，把

鹽鐵礦及手工業置於官辦的經濟政策，依靠政權力量獨尊儒術，對思想文化嚴密控制，這些政策有效的延續封建制度，遏制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再者，就是運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來分析中國社會等(金觀濤, 1994:17-21)。

中國大陸於一九七八年「四人幫」下台以後，對這問題的討論更加蓬勃(白鋼, 1984:182-3)。其中有些學者已經可以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另闢理論路徑來解釋此問題。譬如從結構性的觀點，將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與意識型態結構視爲一整體，從而解釋中國社會的發展特色(譬如金觀濤, 1994)。

還有一種觀點，是從技術性的角度來分析，認爲從中西歷史發展的比較過程中，發覺中國最大的弱點是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技術能力尙未展開，龐大的軍事政治問題已壓得無法喘息(黃仁宇, 1988:182)。

至於西洋學者在研究中國的無發展上，亦有很大的成就。他們的觀點大致上可分爲以下幾種：第一種是階級理論，因爲中產階級在封建歐洲形成了資本家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中國缺乏有力的商人階級；中國的城市缺少特許權以作爲商人自主的基礎，因爲國家組織有力的控制著商業，同時爲商人設定了名望的標準，使得富商及其下一代總是想離開商人階級。

第二種是市場理論，認爲市場的傳統主義造成中國的落後。原因是傳統主義形成了特殊的商人群體，他們發展出嚴格的像行會一般的組織以及獨佔性的經營，妨礙了自由市場的貨物流通，同時也阻撓了資本主義交換關係的發展。再者，傳統主義也形成市場買賣結構。人口的快速增加造成資源逐漸減少，加速了對有效資源的競爭，相對於現有的工作，就出現了過剩的勞動力。這些條件有助於